

一 千古人口之谜

螽斯羽，诜诜兮，

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

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

宜尔子孙蛰蛰兮！

——《诗·周南·螽斯》^①

1. 天下有三众

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息繁衍，似乎太急

按：卷首所引《螽斯》，为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篇。螽（zhōng，音终），一种类似蝗虫的昆虫。斯，助词，作“之”、“的”讲。诜诜（shēn，音申），薨薨（hōng，音轰），揖揖（jí，音辑），均指螽会聚时发出的声响；振振，绳绳（mín，音敏），蛰蛰，均形容其群体盛大且绵延不绝。本篇以螽之多而成群，祝人子孙众多。

促了。人们刚刚送走“世界 50 亿人口日”（1987），又迎来了“亚洲 30 亿人口日”（1988）。而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早在 1981 年就已步入 10 亿人口的大关，1989 年 4 月度过“中国 11 亿人口日”，1995 年 2 月又度过“中国 12 亿人口日”。现实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几乎已是家喻户晓。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今日的 10 多亿人口，也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有着自己的昨天和前天。本书所着重向读者介绍的，是中国人口的昨天，也就是它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还是首先把目光投向它的前天——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自古就拥有众多的人口。据晋代人皇甫谧（215～282）所著《帝王世纪》载，早在 4000 余年前的夏禹时代，中国人口即达 13553923 人。应该说，这一精确到个位的记载本身并不可靠。因为当时中国刚刚进入文明时代，能否对这样规模的人口进行全面深入的普查是大有疑问的。但考古发现证实，100 万年以来，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始终有人类生息繁衍。生活在数十万年前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在中国

分布很广。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生活在数万年前的较为进步的人类，如山顶洞人，已具有相当明显的黄种人特征，从而表明了他们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亲缘关系。人类约在 1 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自那时以来，种植经济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口更加兴旺了。考古发现的事实是最为雄辩的：经历了 100 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遗址，迄今只发现 60 余处；而只经历了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遗址，目前已发现的即多达 6000 余处。

中国约在公元前 22 世纪开始进入自己的文明时代，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王朝——夏。以后又迭经商、周等王朝的更替，至迟在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已逐步确立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孟子（约公元前 372 ~ 289）说过：给每家 5 亩地的住宅，四周种植桑树，50 岁的人就都可以穿丝绵袄了；饲养鸡狗猪等家畜，要不失时机，70 岁的人就都可以吃肉了；给每家 100 亩土地，不要错过农时，8 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他所描绘的，就是一幅理想化的小农经济生活画面。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直接与自然

界打交道，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我们从孟子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小农经济所能经营的土地规模又是极其狭小的。周代的百亩仅合今天的 28 亩多一些。若换成公制来表示，则 1 平方公里的土地就需 50 多农户来维持。由此可见，相比若干民族的游牧经济与西欧的粗放的农牧经济，中国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反过来看，既然百亩之田就可以保证一个八口之家“无饥”，中国的小农经济显然比其他经济能够供养多得多的口。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来维持，同时又能够供养众多人口的经济活动方式。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夺霸权的需要，强制早婚，鼓励生育，既是以小农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又使小农经济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中国，从此便以自己的众多人口著称于世了。据记载，战国时期各大国的兵车均以“万乘”计，一次战役所投入的总兵力往往可达百万人。史书形容当时齐国都城临淄（zī，音资）街上行人之多，说是：车轮相碰，人肩相摩，衣襟连接起来可成帷幕，挥洒汗水像是在下雨。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户口统计工

作，是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789）周王朝在太原地区（今甘肃东部）“料民”（料：计点，清查）。当时周宣王在江汉之间被姜氏之戎打败，便在太原进行人口清查以补充兵员。这只是在很小范围的人口清查，但还遭到了臣僚仲山父等人的反对，理由是：“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可见实行人口清查确实不容易。因此，前面所举的夏禹时代的人口数字，其实只是表达了后人，也即汉晋时代人们的一种估计或认识。而这种估计或认识，无非是说中国早在夏禹时代就已经拥有了众多的人口。现存最早的较完整也较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是《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全国共有 12233062 户，59594978 口。西汉的疆域与今天并不一致，但它的人口繁华地区始终没有超出今天的国界。考虑到《汉书·地理志》的统计也会有若干缺失，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中国人口不少于 0.6 亿。一般估计，公元元年前后全球总人口大约在 2.5 亿 ~ 3 亿。那么，当时中国人口就已占到世界总人口的 1/5 ~ 1/4 了。

随着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的众多人口，也常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元 3 世纪，正值中国三国鼎立之时，吴国有一位名叫康泰的

人游历了南海诸国。他写下了一部《外国志》，内中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三国之时，中国国内遭逢东汉末年以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可它还是以自己的众多人口，与罗马帝国的众多财宝、西域国家的众多马匹并称于世。此后，东晋、隋唐时代的佛经，以及唐宋时代到中国通商的阿拉伯人的记载，也都提到中国人口之众。元代后期游历中国的意大利人鄂多里克（*Odoric*, 1265 ~ 1331）说：中国人口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中国城市的平常人口，也比威尔士大庙会时的人口为多。明代末年来中国传教的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e de Semedo*, 1585 ~ 1658）也说：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我在此生活 20 多年了。但每次外出总要重新慨叹中国人口之众。在城市，可说是肩肩相摩，使人无法前进；即使在农村，路上行人的猬集，也可以与欧洲庙会时的情形相比。他们都以亲身感受到的人口密度的对比，来竭力说明中国人口的众多。

2. 一笔“糊涂账”

然而，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国的

人口在西汉以后的一千数百年间，似乎始终没有增长。表 1-1 所列的历代户口的部分统计表明：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以后，仅东汉后期、唐中期、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及元明两代的人口接近或略超过西汉盛年人

表 1-1 中国历代户口统计

时 期	公元 (年)	户 数	口 数	户均人口
西汉 元始二年	2	12233062	59594978	4.87
东汉 中元二年	57	4279634	21007820	4.91
东汉 永寿三年	157	10677960	56486856	5.29
西晋 太康元年	280	2459840	16163863	6.57
隋 大业五年	609	8907546	46019956	5.17
唐 武德年间	618~ 626	2000000	—	—
唐 天宝十四年	755	8914709	52919309	5.94
乾元三年	760	1933174	16990386	8.79
宋 大观四年	1110	20882258	46734784	2.24
宋金 绍熙元年	1190	19294800	73948158	—
合计 明昌元年				
元 至元二十八年	1291	13430322	59848964	4.46
明 洪武十四年	1381	10654362	59873305	5.62
万历三十年	1602	10030241	56305050	5.61

资料来源：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之甲表 1 摘编。

口在北宋后期户数大大超过西汉，也是中国历代户数统计中最高的，但口数却远低于西汉，以至平均每户仅 2.24 口，使人无法置信。明朝历时 276 年，其稳定期之长超过以往历代，但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的户口统计数不仅低于明初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的统计，甚至还低于一千六百年前的西汉户口。人们不禁要问：上述历代的户口统计，究竟是反映了某种历史的真实，还是根本不可置信的一笔糊涂账？

我们当然不赞成“全盘否定”的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历代王朝既然能够成功地统计着中国的众多人口，它们也必然有着自己行之有效的人口管理与调查统计的制度。然而要真正弄清楚那些扑朔迷离的人口统计资料，人们还得付出十分艰辛的劳动。已故梁方仲教授就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认真分析比较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调查制度后，指出：我国自秦汉以来，即已建立起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

《史记》、《汉书》中保留有相当丰富的局部登记的记录。全国性的记录，则以《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帝元始二年的记载最为全面详细。是年不仅有全国的民户和民口数，而且列有各

州、郡及若干县份的户口数字。其中有些县份，可能还是周末或汉初的原始记录。《汉书·西域传》中，甚至对当时西域诸国的户口数和“胜兵者”（会使用兵器的战士）人数，都有详细的记载。东汉以后，中国迭经天灾兵燹（xiǎn, 音险），人口变动很大。但历代王朝只要有足够的条件，一般总要进行全国性的调查。隋唐还有“貌阅”或“团貌”，规定地方官吏每年检阅人丁的形貌。明代初年更进行过全国性的普遍人口调查。为人口调查而颁行的户帖，登记项目相当完备，连英、美学者在看到户帖的样本后，也不得不承认是世界上“最早试行全面的人口普查的历史证据”。至于一向被不少学人评价很高的罗马的人口调查制度“census”（有译作“国势清查”或“国势调查”的），其实既非全民登记，更非全国登记，只能说是一种局部人口的登记。而历史上古代中国的人口调查制度，“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世界各国中最先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规定比之资本主义国家更完备严密得多”。

但是，指出古代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先进性，并不等于说，历代的那些统计数字都可以不加考辨地直接引用。毫无疑问，中国历代王

朝的户口登记或调查，都是为统治政权服务，首先是为税收的需要服务的。因此，有登记必有反登记，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纳税者逃避登记的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历史上所记载的人口记录，往往有相隔不多年便突然大量减少。和平时期自不用说，是逃亡失记；即使在天灾兵燹之际，也并不都是自然人数的减少。剖析问题的关键，在于掌握历代赋税征收对象的演变。也正如梁方仲所指出的：汉代的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因而汉代的人口调查，是以口数和户数并列。及曹魏至唐，政府收入始以户调为主，所以户数的调查成为政府最关心的事，口数调查退居次要地位。北魏及唐，口数的记录多缺可为明证。自唐代中叶以后，作为户调制物质基础的均田制已渐趋废止。尤其是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土地分配日益不均。地籍的编制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户籍又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到了明代后期，地方政府关心的只是税册的整顿及其使用，户籍与地籍是否符合实际都可以满不在乎了。此时中央所能掌握的只是各地的纳税户口和纳税田地的数字，并不是全国的实际数字。

3. 揭开历史的面纱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代户口统计已不再是所谓“糊涂账”，它们终于变得有规律可循了。而当人们力图依据史实，订正有关统计资料，重新建构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模式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主要是秦汉以来人口的发展，表现为相当明显的周期波动性。这种人口发展的周期，大体对应于王朝的周期。人们发现：每当新旧王朝鼎革之际，几乎总要发生破坏性极强的社会大动乱。在战争、灾荒、瘟疫等因素的影响下（往往表现为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人口的数量可在极短的时间里降至最低值（谷值）。史书中于此经常出现“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户口减半”、“白骨蔽野，外绝居人”的记载。而当新王朝建立起来以后，首先总要经过或长或短的休养生息的恢复阶段。于是民间渐渐“人给家足”，官府也“廩庾（lǐnyù，音凛语）尽满”，“府库馀财”。人口则开始进入为时极短的高速增长的阶段。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可供方便利用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开始激化，人口增长的速率又渐渐放

慢，于是又进入了持续时间相对来说要长得多的低速增长阶段。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已经变得很大，人口绝对数的增长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一阶段结束时的人口数量，通常也就是该王朝人口的最高值（峰值）。而在此之后便“盛极而衰”，又因社会危机的爆发而进入急剧下降阶段，人口再次迅速跌落到谷值。再后，随着社会动乱的平定或新王朝的建立，人口恢复增长，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人口史学家们估计：经过秦末的大动乱，汉初（公元前 200 年前后）人口可能只有 1500 万~1800 万人。文帝、景帝时期人口的年增长率可高达 10‰~13‰，到武帝初年（前 134）达到 3600 万人，翻了一番。此时西汉国力最盛，人口却远未达到峰值。西汉后期人口年增长率降到 6‰左右，但总人口还是由宣帝时（前 67）的约 4000 万人增加到平帝时（公元 2）的约 6000 万人。此后，经过西汉末年的大动乱，到东汉初年（25），人口又降至 2500 万人。直到东汉后期（180），才恢复到 6000 万人。三国初年（220），大约又仅有 1500 万人。再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变迁，唐代初年（620）的谷值大约为 3000 万人，安史之乱前夕（775）的峰值可达 7500 万

人。北宋初年（960）的谷值大约不到 4000 万人，但后期（1110）的峰值可达 1 亿。南宋与金对峙时期（1210），总人口可能已超过 1.1 亿元初（1275），又降至 6000 万人左右明初（1370）的人口有较可靠的统计，大约不少于 6000 万人，而到明代后期（1620），估计至少在 1.6 亿人以上。

我们在这里所描画的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但从中仍可看出：中国人口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缓慢地增长的。由西汉后期（公元 2）的 6000 万人增长到明代后期（1620）的 16000 万人，其间历经 1600 余年。平均年增长率仅为 0.6‰。

中国古代人口的周期波动性发展，在世界人口史中极为典型突出。有人认为，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发展同样也有波动周期。然而，“波动”虽然依稀可寻，“周期”规律却无从探求。看来只有中国因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加之历史上统一的时期居多，乃至传统文化的积淀，从而独具条件孕育完备的人口周期。其次，我们也不可忘记：人口史学家们之所以能建构起接近实际的中国历史人口发展模式，得益于历代王朝（包括分裂时期）所着力撰修的官方史书及其他留传至今的文献资料，归根到

底，还是得益于历代王朝的人口统计制度。而这一切，也是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难以企及的。世界上有些地区，直到今天仍没有确切的人口统计呢！

笼罩在中国历史人口问题上的面纱已渐次揭开了。我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近代中国人口的考察。

二 一个新周期的开始

—— 清代初叶人口

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1. “小冰期”降临之后

我们不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人口的上限，而是将它提前到 17 世纪的明末清初。这是因为，人口运动有着自身的规律。17 世纪中叶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明确表示着明代人口周期的终结，和一个新周期——清代人口周期的开始。

人口的下降始于 17 世纪 20 年代，而以 40 年代的下降幅度为最大。17 世纪正是地球的寒冷时期，所以又被人们称作“小冰期”。在中国，寒冷的气候从 1620 年差不多一直延

续到 1720 年。小冰期初起时，对中国的影响完全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北方，突然变得异常寒冷和干旱的气候，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大约缩短了两个星期。旱魃（bá，音拔）与蝗灾交相肆虐，结果经常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北方各省人民，尤其是广大贫苦农民，因饥馑而陷入了死亡的绝境。清人的笔记中说：明朝末年，黄河以北的五个省发生了大饥荒，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乃至以人为粮，杀人卖肉，官府无法制止。妇女和小孩被反绑着手卖到市上，称作“菜人”。屠者买去，就像宰割猪羊一样。

除了北方的饥馑外，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人也对明王朝的辽东地区造成了严重威胁。可是此时的明王朝早已度过了它的辉煌的鼎盛时期。腐败的吏治，不绝的党争，使得它无法应付日趋加剧的内忧外患。各级官府只知一味征敛，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正赋之外，又有所谓“辽饷”、“剿饷”、“练饷”的“三饷加派”。幸存的饥民被迫铤而走险，纷纷加入反叛者的行列。造反的农民军与政府军之间的战争从 17 世纪 20 年代末一直持续到 1644 年明王朝覆灭。饥馑与战乱使得北方地区到处呈现凋敝的景象。据清朝初年的记载，直隶（今河北，含北京与天津）是“极目荒凉”，“百姓

流亡十之六七”；山东是“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河南则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大江以北，积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

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后，激起了各地的强烈反抗。明朝残余势力与农民军的反清斗争一直坚持到1661年。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抵抗者采取了血腥的屠戮政策。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10天杀死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嘉定前后三次被屠城，死者2万余人，史称“嘉定三屠”。江阴城破后，近10万人死于非命，幸免于难者仅53人。其他重要城市，如松江、漳州、广州、南昌等都遭受到程度不等的破坏。南方的半壁山河也在清军的烧杀抢掠下支离残破了。史载，湖南、两广等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四川省直到康熙十年（1671）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伴随着饥馑与战乱的，还有可怕的瘟疫。目击者的记叙表明：某种瘟疫曾于17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各地广为流行，很多居民稠密区因而损失了半数以上的人口。这种瘟疫的确切性质还很难判定。有些研究者推测：可能是满人在其早期入侵时带进了某些微生物，而汉人